

## 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王绍源 任宇东

**[摘要]** 厄瓜多尔的“美好生活”理念源于印第安土著的传统思想，是安第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的诞生是由多方主体共同合力的结果，因此，通过“厄瓜多尔土著民族同盟”和科雷亚政府“‘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的对比分析，有助于厘清“‘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历史脉络。科雷亚依托“‘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构建了一种挑战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模式，这对于探寻一条融合本国国情和民族智慧的新发展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厄瓜多尔土著民族同盟 美好生活 社会主义 科雷亚

拉美地区“美好生活”<sup>①</sup>理念发端于印第安传统哲学思想，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社会良性循环、人与人互利互爱的思辨性成果，是拉美文明中各印第安民族价值观的具体表达，有着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拉美地区“美好生活”理念的核心就是要在自然层面摆脱功利主义的束缚，实现和谐共生；在社会层面摆脱物质至上的社会结构，实现良性循环；在人际关系层面，将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有机结合，实现互利互爱，最终促成人类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统一。

厄瓜多尔前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有机融合印第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创造性提出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是一种推动市场、民生、环境等要素与本国国情充分结合的发展理念与施政方略，是本土哲学思想与新自由

---

\*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及其发展研究”（20FKSB037）、2020年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优秀中青年思政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教育和新趋势及“智能思政”构建研究（20JDSZK125）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好生活”在厄瓜多尔有两种表达方式：一种是“Buen Vivir”，是拉丁美洲地区广泛使用的西班牙语词汇，另一种是“Sumak Kawsay”，该词汇源自厄瓜多尔的克丘亚语，是“Buen Vivir”的土著同名语。Sumak的意思是“崇高的、极好的、美好的、充分的、尊敬的”，Kawsay的意思是“生命、共存、生活”。“美好生活”的概念存在于拉丁美洲的几个土著群体（Kichwa、Aymara、Mapuche和Guarani）中，但在含义上略有不同。上述词汇在本文中交替使用，从科雷亚政府角度切入时采用“Buen Vivir”一词的含义，从土著群体角度切入时采用“Sumak Kawsay”一词的含义，以凸显彼此之间“和而不同”的政治意蕴。

主义替代方案相结合的最典型的体现。“‘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包含三个层面理念：一是明确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观念；二是倡导在符合生态正义逻辑下开发自然资源；三是在实用主义与可持续发展之间构建伦理平衡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旨在将厄瓜多尔构建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安全可靠、生产方式多元高效、民主参与深刻广泛、民族文化自由多元、社会发展健康持续的美好社会<sup>①</sup>。

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错综复杂：一方面，厄瓜多尔左翼政府在印第安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选择联合土著运动组织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展开猛烈批判，共同探索一条助力国家摆脱发展困局的全新道路；另一方面，左翼政府与土著运动组织又在很多政策上存在巨大分歧，各方根据自己的利益目标来阐释“美好生活”这一“流动性”理念，并借此作为划分政治派别的依据。

本文以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的演进逻辑与实践路径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探究“‘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的逻辑进路与建设路径的现实影响，另一方面考察“主权祖国联盟运动”（Movimiento Alianza PAIS）和“厄瓜多尔土著民族同盟”（Confederación de Nacionalidades Indígenas del Ecuador，简称 CONAIE，以下简称“土著民族同盟”）等政治主体的发展态势以及围绕“‘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开展的政治斗争。最后，通过总结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经验，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提供有益参考。

## 一、“美好生活”的逻辑进路——从土著民族同盟到科雷亚政府

揭示“美好生活”理念在政治制度中出现的历史背景，对厘清“美好生活”理念的演进逻辑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厄瓜多尔的式微，土著运动和科雷亚政府在“美好生活”理念的生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换言之，“美好生活”作为政治话语的产生是两个因素合力的结果：一个是土著运动的社会需求，另一个是科雷亚政府的现实政治需要。

### （一）土著民族同盟的诞生与斗争

厄瓜多尔民众的多民族国家理念与当地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厄瓜多尔主要由安第斯高地、亚马孙河流域和沿海地区三大地理区域组成。而土著群体总体上也是按照这三大地理区域来划分的，其中有78%的土著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对于这些土著群体而言，不同的地缘位置形成了彼此独立的部落认同，而身份认同的构建在划分土著居民政治组织归属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土著群体根据“民族”（nacionalidades）<sup>②</sup>和“族裔”（pueblos）<sup>③</sup>这两种相互关联的社群

<sup>①</sup> Eduardo Gudynas, “Buen vivir: Germinando Alternativas al Desarrollo”, *América Latina en Movimiento*, No. 462, 2011.

<sup>②</sup> “民族”（西语：nacionalidades），指厄瓜多尔在法律上承认某一地区具有独特的制度、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组织形式。一个民族通常包括几个族裔，厄瓜多尔最大的民族是位于高地的 Kichwa（或 Quichua）。

<sup>③</sup> “族裔”（西语：pueblos），是指拥有相同语言或文化服饰的集体或社区的子群体。

类别来确定自己的民族身份。剑桥大学地理系教授萨拉·拉德克利夫 (Sarah A. Radcliffe) 指出, 土著人民之所以强烈要求在“民族”和“族裔”中确证身份认同是因为: 一方面, 土著群体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与所处的地理空间休戚相关; 另一方面, 促使政府承认“厄瓜多尔为多民族国家”, 与土著群体所欲达成的政治目的不谋而合<sup>①</sup>。土著民族的有识之士为了团结土著群体, 将安第斯高地、亚马孙河流域和沿海地区各个土著部落联合起来, 于 1986 年成立了“厄瓜多尔土著民族同盟” (CONAIE)。美国犹他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詹姆森 (Kenneth P. Jameson) 认为: 土著民族同盟的政治目标是围绕“多民族”这一概念来增强土著运动的凝聚力, 通过构建政治参与机制, 表达政治立场, 参与政策制订, 旨在将无组织、零散的土著部落运动统一为具有组织性、整体性和影响力的社会运动<sup>②</sup>。美国杜鲁门大学历史学教授马克·贝克尔 (Marc Becker) 指出, 土著民族同盟围绕“民族”构建起的政治框架实际上就是将原住民群体按照族裔、合作社、社区等不同概念组织起来的, 从而夯实厄瓜多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 最终实现权力和土地在得到法律承认的民族之间重新分配的政治目的<sup>③</sup>。

在左翼政府上台之前, 由于文官和军政府长期交替执政, 厄瓜多尔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中。1979 年, 民选文人总统海梅·罗尔多斯·阿奎莱拉 (Jaime Roldós Aguilera) 获胜, 厄瓜多尔开启了民主化进程。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1 世纪初, 厄瓜多尔历届政府都采用新自由主义模式。这导致厄瓜多尔国民经济发展迟滞, 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 人才大量流失。此外, 历任政府腐败丑闻曝光, 声誉扫地, 失去了民众的拥护。因此, 土著民族同盟诞生之初便带有批判性色彩与革命性特征。根据土著民族同盟的斗争历程, 可以从时间上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即 1990 年—2000 年, 土著民族同盟成为“反新自由主义”斗士。土著组织运动在土著民族同盟的带领下成为“反新自由主义”斗争的主角。该组织于 1990 年领导了为期 9 天的全国暴动, 封锁道路并切断了主要城市的粮食供应, 提出了诸如重新分配土地、承认各民族文化与政治权利等要求。土著民族同盟团结带领的土著组织运动取得了卓越成效, 彰显出南美洲土著人民蕴含的社会变革力量。1992 年至 2001 年, 土著民族同盟组织发动了以“封锁道路, 切断粮食供应”为代表的“道路障碍运动” (Roadblocks)<sup>④</sup>, 尽管政府大量雇佣警察进行道路管制, 以阻碍土著人民抵达基多进行示威游行, 但多次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最终赢得了政府当局的妥协与让步。厄瓜多尔在 20 世纪末正值严重的动荡时期, 彼时总统哈米尔·马瓦德 (Jamil Mahuad)

<sup>①</sup> Sarah A. Radcliffe, “Development for a Post-Neoliberal Era? Sumak Kawsay, Living Well and the Limits to Decolonisation in Ecuador”, *Geoforum*, Vol. 4, No. 3, 2012.

<sup>②</sup> Kenneth P. Jameson, “The Indigenous Movement in Ecuador: The Struggle for a Plurinational Stat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38, No. 1, 2011.

<sup>③</sup> Marc Becker, *Indians and Leftists in the Making of Ecuador's Modern Indigenous Movement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37.

<sup>④</sup> C. E. Walsh, “The Ecuadorian Political Irruption: Uprisings, Coups, Rebellions, and Democracy”, *Nepantla: Views from South*, Vol. 2, No. 1, 2001.

在风雨飘摇的国内环境下强硬推行以美元取代本土货币苏克雷的金融政策<sup>①</sup>，触发了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同年便被政变推翻，而土著民族同盟在此次抗议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第二阶段，即2000年—2005年，土著民族同盟遭遇民众信任危机。土著民族同盟多位领导人出卖土著群体利益换取政治权力，这导致同盟的群众基础被严重破坏。其中，2000年—2003年古斯塔沃·诺沃亚（Gustavo Noboa）担任总统期间，土著民族同盟的妥协就是一个明证。诺沃亚采取了一系列损害国家利益的举措，例如，提高天然气和原材料运输价格、向私人公司出让国家资源开采权等。政府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同土著组织代表签署了出卖国家利益的协议，这一举动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猛烈抨击。2005年，总统卢西奥·古铁雷斯（Lucio Gutiérrez）为了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选择拉拢土著民族同盟，任命该同盟领导人马卡斯（Luis Macas）和巴卡里（Nina Pacari）为农业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造成了同盟内部发生分裂的严峻态势。面对危如累卵的紧张局面，如何重新争取民众的信任，在当时成为土著民族同盟发展道路上的一道难题。

第三阶段，即2005年至今，土著民族同盟所面临的变局中孕育着转机。2005年，卢西奥·古铁雷斯由于贪污腐败而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并遭到了反对派多数议员的弹劾。虽然土著民族同盟这一次参与了反对总统的动员活动，但是本次抗议活动担任中流砥柱的却是没有任何政治盟友的城市中产阶级。此时的厄瓜多尔迫切呼唤一位能真正代表民众利益、坚定革新政治弊端的政坛新锐。2007年，关切民众利益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领导人拉斐尔·科雷亚成功当选厄瓜多尔总统，这也成为厄瓜多尔政治环境重新焕发生机的转折点。

虽然土著民族同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高潮与低谷，但土著民族同盟领导的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根植于多民族国家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从区域和国家层面进行了彼此支持、相互交织的论证，最终形成了一套政治话语体系，从而捍卫了厄瓜多尔“多民族国家”的法律地位。

## （二）科雷亚政府施政的理论源泉与重点举措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普遍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谋求发展，然而，新自由主义非但没有成为解决经济发展难题的灵丹妙药，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社会贫困、公平缺失，遭到了人民的一致唾弃。这促使人们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积极拥抱左翼政府的政治革新。英国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吉恩·格鲁格（Jean Grugel）认为，新一代的左翼领导人正在崛起，如厄瓜多尔的科雷亚、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他们向本国民众展示了一种新的发展动力，承诺打破本国新自由主义的“漫漫长夜”，象征着国家发展的未来<sup>②</sup>。

<sup>①</sup> “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3%，外国投资下降了34.7%，进口总额下降了38.4%，而美元对苏克雷的汇率上升了362%……该国1200万居民中有10%选择了移民……厄瓜多尔在1998年还有42家银行，到了2000年仅有26家了。”参见Jose A. Lucero，“High Anxiety in the Andes: Crisis and Contention in Ecuador”，*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2, No. 2, 2001。

<sup>②</sup> J. Grugel and Pia Riggiozzi，“Post-Neoliberalism in Latin America: Rebuilding and Reclaiming the State after Crisis”，*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43, No. 1, 2012。

科雷亚政府的施政方针主要有两大思想源泉：其一是德裔墨西哥学者、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教授海因茨·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sup>①</sup>；其二是由荷兰莱顿大学人类学教授维罗妮卡·达维多夫（Veronica Davidov）提出的“新道德经济”理念。科雷亚结合“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新道德经济”理念对新自由主义进行了全面批判，创造性地提出了“‘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旨在替代厄瓜多尔昔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第一，海因茨·迪特里希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旨在批判新自由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性，并在这一基础上试图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进行超越。“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以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为基础，以符合本国国情为原则，以科学协调国家、市场、社会等要素为手段，以统筹兼顾经济、民生、环保为发展理念，旨在促进社会发展，增进人民福祉。迪特里希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在推动“21世纪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拉美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问题上具有重要意义。

2007年，科雷亚在总统就职仪式上宣布，厄瓜多尔将推行基于本国国情、具有厄瓜多尔特色的“21世纪社会主义”。此后“2013—2017年美好生活计划”正式将厄瓜多尔“21世纪社会主义”定名为“‘美好生活’社会主义”。

“21世纪社会主义”对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反对资本主义、提倡参与式民主、发展人道主义经济、争取拉美一体化”<sup>②</sup>四个方面。一是反对资本主义。“‘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揭示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已经道尽途穷，资本主义的反动与没落已经成必然之势，科雷亚政府以“‘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改革是一种有益尝试。二是提倡参与式民主。“‘美好生活’社会主义”主张民众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拥有决定权，反对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三是发展人道主义经济。“‘美好生活’社会主义”主张公平正义的经济发展模式，反对盲目逐利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四是争取拉美一体化。“‘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倡导构建南美洲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联盟，取得了良好的外交局面，获得一系列政治成果，如积极推动南美国家联盟（UNASUR）、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组织建设，并参与南美洲政治事务管理。

然而，在科雷亚政府取得成就的同时，频发的社会冲突也导致民众对“‘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产生怀疑。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政治学教授格雷戈里·威克斯（Gregory Weeks）认为，“动荡的社会环境、有限的改革成效、猖獗的反对势力和低迷的民众满意度，这些表明

<sup>①</sup> “21世纪社会主义”由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的教授海因茨·迪特里希提出。他将时间—空间—运动范式等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现代科学运用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分析中，将社会主义发展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即早期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现实社会主义和21世纪民主的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即将进入其生命周期的尽头，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条件已经具备。“21世纪社会主义”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参与民主，经济上实行民主计划的等价经济，在拉美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sup>②</sup> 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与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采用了近似范式，相关研究参见许丰：《海因茨·迪特里希与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关系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2期。

‘21世纪社会主义’作为后新自由主义的替代模式值得商榷”<sup>①</sup>。

第二，达维多夫的“新道德经济”理念注重经济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达维多夫认为，自然资源并不是理所应当被开采出售的商品，而应当被视为需要进行保护的自然遗产和人类财富，如果人类对自然进行毫无节制地掠夺开发，那么其后果一定是人类的自我毁灭。此外，由于人类社会的迭代发展和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每代人在享有资源谋求发展的当下也肩负着后代长远发展的责任，这就要求人类要对稀缺的自然资源进行长远的规划和分配。因此，达维多夫强调通过保护环境、集体行动和代际合作来实现经济良性发展<sup>②</sup>。

总之，一方面，科雷亚政府倡导的“美好生活”诸多理念与印第安土著的生存智慧不谋而合，这为土著民族接受“美好生活”理念创造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另一方面，科雷亚政府的施政纲领与“新道德经济”理念不谋而合，“新道德经济”理念可以看作“美好生活”理念在生活实践上的行动指南。

2007年，科雷亚政府召开“制宪大会”，促使“21世纪社会主义”和“新道德经济”两大理念落实到“‘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生活实践层面。新宪法的起草是厄瓜多尔政坛历史性的时刻，“制宪大会”在厄瓜多尔马纳比省蒙特克里斯蒂市（Montecristi of Manabí）举行，有许多政党和社会组织参与了“制宪大会”，其中土著组织、左翼政党、环境保护组织和女权主义组织最为引人注目，而“美好生活”理念成为参会者们利益表达的共同交汇点。

一方面，科雷亚政府通过召开“制宪大会”来寻求利益最大公约数。“制宪大会”是有诸多参会者共同角逐的“权力竞技场”，参会者们在参与过程中绘制了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治蓝图，并力求将关系自身利益的政治愿景纳入宪法。参会者们围绕国家权力体系、环境生态保护、民众政治参与等问题进行了磋商，旨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本次“制宪大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在新自由主义转向的浪潮中，“美好生活”理念成为利益相关者在处理共同争议事务时的优先政治共识。最终，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生态领域建设的“美好生活”理念作为一种有组织、有活力、可持续的国家发展制度计划，于2008年写入了国家宪法并受到了国内民众和政界的一致认可<sup>③</sup>。

另一方面，科雷亚政府通过制定“美好生活计划”来描绘美好生活蓝图。随着政府在2009年批准的“2009—2013年美好生活计划”实施，“美好生活”理念逐步走向实践，深入人心。“美好生活”理念在这一国家计划中进一步被描述为“与新自由主义的彻底决裂”，“后石油时代”发展的新范式、一种崭新的社会契约，以及“社会、经济和民主正义的基础”。同时“美好生活”也从理念落地为强大而有效的政策措施，例如，重视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地域协调，在经

<sup>①</sup> A. Kennemore and G. Weeks,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 The Elusive Search for a Post-Neoliberal Development Model in Bolivia and Ecuador”,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30, No. 3, 2011.

<sup>②</sup> Veronica Davidov, “Saving Nature or Performing Sovereignty? Ecuador’s Initiative to ‘Keep Oil in the Ground’”, *Anthropology Today*, Vol. 28, No. 3, 2012.

<sup>③</sup> C. Walsh, “Development as Buen Vivir: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de) Colonial Entanglements”, *Development*, Vol. 53, No. 1, 2010.

济体制方面通过寻求生产转型、多样化和专业化来促进多种生产方式的良性发展，改善民众生活品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

然而，随着“美好生活”理念指导下的诸多政策措施进入改革深水区，各方主体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暴露出来。厄瓜多尔的经济严重依赖采掘业，因此各主体之间的矛盾便聚焦于此。有人指摘科雷亚政府是右倾机会主义，政府虽然通过收入分配改革促进了社会公平，但依旧保持了以采掘为基础的传统发展模式，这令人失望。其中，对这些政策最猛烈的抨击主要来自环保主义者，他们的批判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自然资源开采对社会和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经济缺乏多样化以及国内经济形势受制于全球商品价格波动。

综上所述，土著运动组织、环保主义者和科雷亚政府都曾经在共同推动“美好生活”理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美好生活”理念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分歧导致了土著运动组织、环保主义者与政府三者背道而驰。每个组织都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来对“美好生活”理念进行定义和阐释。以下将通过定性分析来阐述“美好生活”理念的三个实践路径。

## 二、“美好生活”的实践路径——土著民族同盟与科雷亚政府的对比视角

廓清不同主体所主张的“美好生活”理念，即从土著组织运动角度切入的多元化“美好生活”，从科雷亚政府角度切入的理性化“美好生活”，从环保主义者角度切入的生态化“美好生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把握“美好生活”理念的不同实践路径。其中多元化“美好生活”和理性化“美好生活”是一对主要矛盾，生态化的“美好生活”实则为多元化“美好生活”理念的激进化版本。在这场围绕“美好生活”理念含义阐释的争论中，不同政治主体各执己见，彼此攻讦，这反而使得“美好生活”理念能够以不同促包容，以斗争促发展，从而成为一种极具包容性、普惠性、可塑性的价值观。

### （一）多元化的“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理念展开的第一种路径是多元化。土著民族同盟认为，“多元化国家”是“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得以运作的前提基础和必备机制。长期以来，土著运动都将“多元化”视为一项基本政治诉求，并围绕这一诉求构成了土著运动政治愿景的支柱内容。他们认为，要想捍卫“多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前提，重点是要在土著运动中争取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社会文化权力，并将关注重点放在权力配置、收入再分配、粮食主权、决策参与和社会治理等问题上。

在多元化的“美好生活”话语体系中，争取“民族”和“族裔”的集体权利是土著组织运动的主要目标。根据土著运动组织的政治诉求，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意味着：第一，赋予各“民族”和“族裔”充分的政治权利；第二，改组国家机构，承认现有政府的权威，并将权力和资源移交给现有政府；第三，支持领土内独特文化的语言、特性、习俗、传统、知识和教育。

通过长年累月的斗争，土著人民要求的大多数权利都得到了本国政府的批准，并受到了立法层面的保护。例如，1994年颁布的《人民参与法》、1995年颁布的《行政分权法》以及诸多涉

及土著人民教育权利的法案<sup>①</sup>。但为了保证土著群体相关权利的实现，土著运动现阶段的斗争已经从“承认集体权利”转向了“执行集体权利”。

在多元化的“美好生活”话语体系中，土著民族同盟有贯穿始终的精神内核。“大地之母”（Pachamama）<sup>②</sup>作为人类与自然世界精神关系的一种象征，代表着土著群体角度“美好生活”理念的道德根源与精神内核，土著民族将“大地之母”设想为现代社会全新的文明契约<sup>③</sup>。为了区别于政府关于“美好生活”理念的论述，土著运动领导人和土著知识分子们用源于厄瓜多尔克丘亚语的“Sumak Kawsay”来表达“美好生活”概念，从不用相应的西班牙语词汇“Buen Vivir”来谈“美好生活”。用两种语言表达“美好生活”的不同内涵就成为政府和土著势力之间的政治边界。土著精英们认为，“Buen Vivir”这种新型说辞不过是一种陈词滥调，其实质是新殖民主义实现对民众压迫、剥削的一种工具而已，旨在实现采掘业的相关政策合法化。土著运动组织强调“Sumak Kawsay”具有与“Buen Vivir”截然不同的本体论<sup>④</sup>和认识论<sup>⑤</sup>基础，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Sumak Kawsay”独特的政治意蕴，使之从“发展”“民主”“国家”等主流词汇中分化出来，旨在从根本上打破现任政府的话语霸权。

阿根廷《新社会报》（*Nueva Sociedad*）的总编帕博罗·斯特凡诺（Pablo Stefanoni）认为，土著运动组织过度强调“祖先的哲学和社群主义”，这在凝聚政治力量过程中可谓各有利弊<sup>⑥</sup>。一方面，强调土著民族话语权能够愈发巩固土著文化认同和土著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强调土著民族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权主义者、生态学家、社会主义者等群体赋予“Sumak Kawsay”的新意蕴，不利于团结各方社会力量。不但如此，土著组织运动割裂了与民众生活的联系，片面强调“Sumak Kawsay”的哲学基础，这在政治对手看来无异于孤立群众。

① Donna Lee Van Cott, *From Movements to Parties in Latin America: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7.

② “大地之母”（克丘亚语：Pachamama）：也被音译为“帕查玛玛”，是安第斯土著人崇敬的女神，也称为大地/时间母亲，被视为是仁慈和赠予的女神，同时被看作大自然本身。

③ 在安第斯人的世界观中，万物都有一种“精神”，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彼此之间和谐相处、创造生命。“Sumak Kawsay”寻求的就是用“共存”来创造生命。在政治上，建设崭新的文明阶段不是源自资本财富的积累，而是源自与环境的和谐共存，源自人类对其他任何存在的尊重和理解。

④ “Sumak Kawsay”最早可追溯自拉丁美洲印第安人的古老思想，土著先哲们信奉生命在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中延续，尊崇自然界生物的多样化和世界的平衡秩序。“Buen Vivir”在本体论层面上是要为政府和公众提供政策和行动方案以供实践，在国际社会中宣传这一概念，以此作为过度消费和生态系统退化的解决方案。

⑤ “Sumak Kawsay”在认识论层面上可以理解为：充实的生活、充分地享受生活，与大地母亲、宇宙、生命的周期循环同步运行，与世间万物平衡相依。如果残酷的竞争让人类对待同胞如同敌人、工作太忙而无暇与亲人相处、成功的压力太大而损害了身心健康，那么社会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每个个体的生命都与他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自然万物是平等的，人类并不能掌控自然。幸福来自内心的和谐与平静，与万物生灵的和谐共存。“Buen Vivir”在认识论层面上是要建立一个多样化的、和谐的、团结的、与自然共生的社会，人民要过上美好的、有尊严的、公正平等的生活。衡量标准是：生产多样化和经济安全、人民享有最好的福利、有尊严的劳动和居住、社会公正（包括种族、性别、年龄和地区公正）、文化多样性、社会参与等。

⑥ Pablo Stefanoni, “¿Una nueva izquierda?”, <https://rebellion.org/una-nueva-izquierda/>.



## （二）生态化的“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理念展开的第二种路径是生态化。生态化的“美好生活”实为土著组织发展理念的激进化版本。这一论述的倡导者主要是环境保护学者和生态组织。国家宪法赋予的“自然权利”是这一论述的核心，它与土著、农民、女权主义者、生态学家和社会主义团体等各种社会群体的权利密切相关。他们认为，承认“自然权利”才是通向“后发展时代”“后石油时代”和“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正确道路。他们将资本主义视为致使劳动异化、经济低迷、社会不公、环境退化的罪魁祸首。要改变这种现状，就需要将生态化的“美好生活”理念贯彻到地方建设、社区治理和小规模项目上，这样既能保证尊重自然环境，又能保证人民能够真正参与到“‘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

环保主义组织主张实施社会团结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包括：确保粮食主权紧握在人民手中，尊重集体土地所有权并公平分配土地，充分重视旅游业发展以期取代采掘业，以及呼吁国家为小规模项目提供财政信贷等激励措施。根据环保主义组织对科雷亚政府“‘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的不同态度，可以划分为“极右翼环保主义组织”和“理性环保主义组织”两个派别。“极右翼环保主义组织”污蔑科雷亚政府“‘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与政策是一种新殖民主义模式，理念的背后是政府与跨国资本彼此勾结，认为科雷亚伙同拉美其他左翼政府通过发动“粉红浪潮”来达到控制自然资源的目的。“理性环保主义组织”则高度赞扬“‘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表现出的解构政治霸权的巨大潜力，尤其是在对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霸权现象具有强大的消解作用。因此，他们认为，“‘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是一种需要通过众多行为者共同参与、不断构建的思想，不应由某一个政治党派来擅自定义。

## （三）理性化的“美好生活”

“美好生活”理念展开的第三种路径是理性化。科雷亚于2005年组建了“主权祖国联盟运动”，该党迅速成长为厄瓜多尔第一大党并取得执政党地位。

为了建设“‘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科雷亚领导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主张基于代议制民主和参与式民主来巩固国家法治，并推行了多领域、深层次、立体化的“公民革命”。“公民革命”主要包括五大核心：“宪法革命”“道德革命”“生产力革命”“社会革命”“主权和拉美一体化革命”<sup>①</sup>。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伊恩·巴奇（Ian Bache）认为，科雷亚政府采取政策措施都是依据“新马克思主义”这一范式来制定的，尤其是通过迪特里希的“21世纪社会主义”和达维多夫的“新道德经济”来巩固“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指导地位<sup>②</sup>。

科雷亚政府在推行“‘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难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妥协的政治策略，复杂的资源争端，虚假的政治参与。

第一，在政治策略方面，科雷亚政府部分举措存在贯彻不力的情况，凸显政策策略的妥协性、折中性和实用主义倾向。推行“‘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有利于科雷亚政府在新自由主义变革浪潮

<sup>①</sup> 徐世澄、唐俊等：《拉美左翼和社会主义理论思潮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193-205页。

<sup>②</sup> Ian Bache and Karen Scott, *Wellbeing in Politics and Policy*, New Yor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8, p. 134.

中掌握国家航向的“船舵”，从而摆脱新自由主义时期财政政策紧缩、金融管制松垮和金融利益至上的艰难处境。由此可见，“‘美好生活’社会主义”代表了一种能够与资本主义发展秩序分庭抗礼的发展模式，是政府为了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选择。然而，作为“‘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推行者的政府官员却在施政时显得“态度暧昧”，例如，科雷亚政府为了争取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提供的4亿美元贷款，投其所好地调整了厄瓜多尔的经济政策以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评价指标，诸如调整和取消补贴、继续加大石油和矿业开采量等。由此看出，诸如上述科雷亚政府所为不禁让民众坚信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改革都是秉持实用主义的路线，而非新自由主义替代方案。

第二，在资源采掘领域，存在着政府、土著组织、环保组织三者之间复杂的资源争端。一直以来，强有力的财政纪律和充盈的公共投资都是“‘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为了发挥财政“定海神针”的作用，国家从经济层面切入，重点关注投资、控制和监管领域。政府官员认为，国家投资和社会支出的主要财政来源仍然是石油收入，想要使经济实现多样化发展就必须开发自然资源。因为只有财政收入得到提升，政府对其他经济领域的投资才能水涨船高。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即使许多措施与官方文件或法律中涉及“环境保护”“土地政策”和“公众参与”的条文存在矛盾，但由于主要矛盾是“实现经济多样化发展”，其他分歧就沦为次要矛盾。总之，政府的这些发展观念与土著群体和环保组织之间存在着诸多分歧。

第三，在政治参与方面，由于“公民参与”落实不力，政府内部的反对意见可谓此起彼伏，甚至引发了一些政府官员对“2013—2017年美好生活计划”的诟病，指责“公民参与”纯属一种“装饰元素”。因为上层并没有接受来自民众的批判性参与的政治意愿，反而只有那些说一切都“完美”的人才可以参与政治，政府一方面积极寻找土著组织运动中的合作伙伴，另一方面也对组织中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予以强硬压制。随着土著运动的式微，民众发动示威游行的代价愈发高昂，很难倒逼政府真正落实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甚至来自政府内部的批评人士也质疑现任政府是否能接受<sup>①</sup>。

在上述三大矛盾的交织下，力挺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政治势力死灰复燃。科雷亚政府由此发起了一场反对保守复辟、反对开历史倒车的政治界限划分运动。由于这些名义上的“政治家”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参与了政府决策，却险些将厄瓜多尔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科雷亚政府对反对派官僚、银行家、工会组织的可信性和合法性提出疑问。科雷亚以“不准忘记”（Prohibido olvidar）为口号，通过列举政客们贪污腐败、谋划政变、出卖国家资源和扰乱金融秩序的罪恶行径，痛斥那些政治组织意图制造混乱，破坏社会稳定<sup>②</sup>。此外，科雷亚和反对政府开发资源的环保主义组织展开辩论。政府斥责参与亚苏尼（Yasunidos）国家公园石油开采抗议活动的团体和参加激进生态保护组织的年轻人是“幼稚的叛徒”和“国家利益的敌人”<sup>③</sup>。

<sup>①</sup> Carlos de la Torre and Andrés Ortiz Lemos, “Populist Polarization and the Slow Death of Democracy in Ecuador”, *Democratization*, Vol. 23, No. 2, 2016.

<sup>②</sup> 参见〔厄瓜多尔〕拉斐尔·科雷亚·德尔加多：《厄瓜多尔：香蕉共和国的迷失》，尹承东、郭旭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4年，第2-3页。

<sup>③</sup> Ian Bache and Karen Scott (eds.), *The Politics of Wellbeing: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Switzerland: Springer, 2018, p. 140.

总而言之,虽然科雷亚政府在公共投资和基础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面对如何保证“‘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的连贯性和包容性问题时,人们普遍抱有质疑态度。在构想国家发展蓝图时,每个社会群体基于自身利益提出了迥异的施政理念,这些理念涵盖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成为划分政治派别的依据。因此,不仅需要国家能够以开放的政治参与平台这一姿态重新回归,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哪些主体能参与其中并最终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通过考察这些政治分歧演化分裂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科雷亚政府对不同政见的包容及其为营造政治参与空间所做的不懈努力。

### 三、结 论

纵观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美好生活’社会主义”在消解话语霸权方面表现出巨大潜力,促成了“以斗争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的政治发展格局。在科雷亚政府和土著运动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与传统价值观相结合,与“多民族”的国情相结合,与时代接轨,体现出开放性和包容性。但作为一种指导思想,它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深陷实践困境,经济发展首当其冲。石油出口为政府提供稳定收入,是实施“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经济支柱。但2011年—2016年国际油价持续下跌,经济发展受到牵连,厄瓜多尔政府被迫缩减教育、医疗等民生支出,暴露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二是“美好生活”理念仍需法理层面论证。一方面,“美好生活”理念在宪法层面赋予了自然以主体权利,但是自然作为非公民的基本权利主体的合法性,依然需要法理支持。另一方面,由于传统的“美好生活”理念只是部落文明下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一理念想要超越这样的历史局限,成功适配于一个多民族的现代化国家依然任重道远。

但值得肯定的是,“‘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立足于本土理念和文化特色,探寻一条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全面推进的现代化道路,这对于实现厄瓜多尔长足发展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为本土哲学思想如何适配于现代社会发展进行了合理尝试。“‘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的多元原则在充分尊重本民族理念和文化特色的基础上,满足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劳动、集体、团结”的尊重,最重要的是展现了对自然的尊重,这与厄瓜多尔当今的社会发展理念不谋而合。二是在社会实践领域秉持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美好生活”理念在“经济稳定”这一层面另辟蹊径,不但囊括了稳定物价这一基本要求,还赋予了“经济稳定”一种更为宽泛的概念,即经济稳定的“可持续性”。“美好生活”理念将关注的重点与人民的利益紧紧捆绑,深入到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福利等重要领域。

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是杂糅了科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和安第斯社会主义的综合体。这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第一,这一理念诞生之初就肩负着反抗新自由主义痼疾,利用本土哲学智慧谋求对资本主义制度超越的重任;第二,科雷亚执政后充分借助这一理念,对国内社会生产进行了有计划的调节与指导,缓解国内供需矛盾,提高社会生产

效率；第三，这一理念根植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土哲学，在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充分展现了本国人民对于自然环境的重视与对自然规律的运用；第四，这一理念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要求，是拉美左翼政治实践的积极尝试。

但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存在局限性。其一，该理念在政治上摒弃了阶级斗争这一最高形式。科雷亚领导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作为一个脱胎于西式民主选举制度的执政党，为确保执政地位稳固，难免有实用主义倾向，谋求政治立身而妥协，无法彻底地完成革命。这必然导致“‘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在实践中受阻。其二，科雷亚领导的“主权祖国联盟运动”作为一个以执政为目的左翼联盟，混淆了手段与目的的辩证关系，并不是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关键时刻会暴露出面对矛盾回避、面对反扑软弱的致命弱点。其三，该理念在经济上反对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组织生产，在诸多政策主张中，与控制生产资料相比，“生产资料民主化、国家民族多元化、国家主权独立化、拉美国家一体化”等左翼政治话语更能维系党内稳定，博得民众支持。总之，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凸显出了战略短视化、组织松散化、内部矛盾公开化、施政方略实用主义化等缺点。

当前，拉美政治生态的典型特征“钟摆效应”再次呈现于厄瓜多尔政坛。科雷亚于2007年、2009年、2013年三次当选总统，直到2017年将总统位置移交给“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候选人莱宁·波尔泰雷·莫雷诺·加尔塞斯（Lenín Boltaire Moreno Garcés）。莫雷诺执政后，重点关注反腐败斗争、同各行业组织对话推动民生建设。然而，在施政方略方面，莫雷诺并没有延续前总统科雷亚的执政理念，“主权祖国联盟运动”发生分裂，“‘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推行受阻。2021年4月，“创造机会运动-基督教社会党联盟”（Movimiento Creando Oportunidades-Partido Social Cristiano，简称CREO-PSC）候选人吉列尔莫·拉索（Guillermo Lasso）当选总统，厄瓜多尔右翼政党时隔15年重新上台执政。但“‘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在厄瓜多尔全国左翼政党中仍然占据较大的话语权，有望在“钟摆”倾向左翼时再次焕发生机。

上述对“‘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的分析表明，厄瓜多尔并不存在一种统一、完整、直达本质的“‘美好生活’社会主义”概念，“美好生活”这一极具流动性的理念依然是一个进行时而非完成时。显然，“‘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正在经历一个逐步成熟化的过程：各方主体依托“‘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的开放与包容，在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建言献策，在斗争与合作中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纠纷。总之，“‘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根植于厄瓜多尔本土哲学，积极与时代接轨，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特征，极大地激发了各方主体的参政热情和政坛活力，打造出彼此角力又彼此促进的政治氛围。厄瓜多尔“‘美好生活’社会主义”理念及其实践能够为拉美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提供参考。

（王绍源系山西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任宇东系山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晓 风]